



考古学探索未知、揭示本源。百余年来，几代考古人在山川河岳间延伸历史的轴线，孜孜探寻中华文明起源，努力建设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考古学。本期读书版聚焦一组华夏上古史专著和一部长江文明史论著，一起走进——

历史的天空

上古月色

□ 龚艳平

一
公元前841年，对中华文明史而言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。

这一年，是西周共和行政元年。从此之后，因文字记载获得妥善保存，中华文明史进入完全信史时代。这一年，是中华文明史研究的一个分水岭。从这一年开始，历史是模糊不清的。《史记》虽然是从黄帝写起的，但是直到这一年才开始给予准确的纪年，此后的史家也依此延续。

探索遥远的古代文明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。追寻“上古三代”，探究“何以中国”，是我们对自身文化和血脉的叩问和探寻。为此，我国于世纪之交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，用科学手段对夏商周三代校准“时间表”；夏朝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，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，商周分界（武王克商之年）定为公元前1046年。虽存争议，但已是目前最优解。

年表的初步确立，在古老的文明迷雾中，标下闪亮的坐标。

二

在过往的上古历史叙述中，商周易代的面目是模糊的。对于背后的细节，更是知之甚少。如今提起这个时期，大多数人的脑海中，估计首先会浮现一部《封神榜》，再多一点，或许会联想到青铜、甲骨。

王国维在《殷周制度论》开篇即言：“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，莫剧于殷、周之际。”但殷周之变具体如何“剧”，知之者不多，能说清的人更少。李硕打磨10年，完成《翦商》，借助文献史学发现和考古发现，拨开重重迷雾，推想三千年前的风云激荡。

所谓“翦商”，就是周朝讨伐翦灭商朝的计划。孟津观兵、誓师伐纣、牧野大战、武王克商。武王死后，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一些风俗，并消除了相关的文字记录，由此留下历史的记忆空白。

殷周之变，华夏新生。王国维认为，“殷、周间之大变革，自其表言之，不过一姓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；自其里言之，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，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。”李硕说，殷周之变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政权更替，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。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

李硕通过独特的叙事与线索归纳，讲述殷周之变，讲述了一段与我们对“三代之治”认知不太一样的上古历史，揭示了一种新奇大胆又言之成理的历史可能性，可谓“一家之言”。这个“一家之言”，不同于“戏说历史”，是基于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的历史猜想、历史推理，并构成了一个完整而自洽的体系。

几千年的漫长岁月，需要添加多少辅助线，才能勉强拼出一个潦草的岁月拼图？猜想和推理当然会有瑕疵，不过这些属于白璧微瑕，对于上古史的研究，问题比答案多。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在《何以中国》一书中说：“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，但仍怀着最大限度逼近真相的执着。”

三

历史的长廊里，上古文明的身影模糊，但那遥远的脚步声还在回响。这就是人类祖先遗留下来的文献典籍，以及存埋于地

面或地下的文物实体。

20世纪初，王国维创造性地用传世文献和地下文字材料互证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最终确认甲骨文和殷墟的主人系历代商王，使商代后期的历史成为“信史”。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界以极大的鼓舞。

20世纪20年代开始，中国学界便开始以“二重证据法”——通过有限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资料双重考证，来还原殷商文明，试图打通这段因史料缺乏造成的文明断层。百余年来，他们就像在茫茫大地寻找一个个脚印，串成我们祖先的足迹。

考古学家张光直的《商文明》是一部成书于40多年前的经典著作。他依据当时已知的考古发现和文献材料，从历史文献、青铜器、卜甲和卜骨、考古学、理论模式这五个角度切入，勾勒了一幅商文明的图景。

读老先生的书，也被他的一个历史构想——“三代平行发展”所震撼。商为夏的小国，周为商的小国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“夏遗民封国于杞，商遗民封国于宋”。杞这个夏的后裔，是商周两代的一个小国；商灭亡以后的遗留国宋，是周代的一个小国。因此三代的相互关系不仅是传承的，也是共同存在的同时期国家。

“我相信三代平行发展的思想是解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关键。”他认为，商文明上可追溯至夏，下可延续至周，其分界仅仅是由于政治变革造成的，而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是不间断的。

所谓“上古三代”，并不是完全线性发展的三个蛮荒世界中的文明孤岛，而是三个互相交会、互相斗争的文明核心，在它们周边还有许多共享着文明成果的小型文明，或称“方国”。

在书中，他重点提到了羌方。对商人来说，羌方是一个特殊的国家。商人与羌方之间战争不断，商人经常动用大批军队，有时一次就多达1.3万人。据考证，羌方还是参与周人最后征商之战的众方国之一。

读至此，容易让人联想到赣地的区域性文明——虎方。在江西文化符号丛书之一《青铜文化》中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广明介绍了赣江-鄱阳湖流域灿烂的青铜文化。20世纪70年代吴城遗址的发现，是中国南方青铜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，打破了“商文化不过长江”的旧说。据分析，这里是与商王朝处于同一社会发展阶段的雄踞一方的区域性文明。吴城文化既与中原殷商文明有密切关系，又有地方特色。

殷商时期有几个以虎为名的国家，其中之一便是虎方。在所有殷商时期以虎为名的国家中，它的历史最为悠久，且所处的位置应是南方。根据分析，专家推测，“虎方”政治中心早期可能在湖北武汉盘龙城，晚期则转移至江西新干牛城。

新干大洋洲青铜文明，集中反映了这个区域性文明的灿烂。新干大洋洲出土器物上的虎有57只，虎多成群、气势赫赫。以伏鸟双尾虎为代表的虎形器物，是商代江西虎方国家的文明符号象征体系。

由于文献记载不足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南方被扭曲成愚昧、落后的所谓“蛮荒”之地。如今，大量的考古发现证实，南方地区在中华古代文明的形成过程中，曾做出过令人瞩目的贡献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四

遥远的时代，“中华大地文明火花，真如满天星斗”。

这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在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中提出的“区系类型”说，勾勒出全国六大区系并立的模式，更为形象的说法是“满天星斗”。对中华文明的起源，他认为，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，如同天上满天星斗。

苏秉琦强调“多元”，他的学生、考古学家严文明提出“重瓣花朵”，中心位置在中原，好比花心。围绕中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文化区，就好比内圈的花瓣。外圈还有很多区域文明，这些区域文明好比是外圈的花瓣。花心与内圈花瓣、外圈花瓣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，既是统一的，又是多元的。

某种程度上，寻找文明起源，并不是一个寻找既定答案的过程，而是一个阐释观点的过程。这不是一道填空题，而是论述题。中国考古界关于文明与国家起源的考古学探索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过多种认知模式，比如“中原中心说”“满天星斗说”“中国相互作用圈说”“重瓣花朵说”“多元一体说”，等等。

文明探索之路，任重而道远。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续至今，还有不少“空白点”，等待我们去探究。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后，研究中华文明起源这个更大的问题，随即被提出来。2002年春天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，意图寻找并理清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、发展的大脉络。距今，探源工程已经进行了20多年，深耕上古时代，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。

良渚、陶寺、石峁、二里头，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。二里头位于河南洛阳偃师，是一个晚于良渚、陶寺、石峁等遗址的广域王权国家，有“最早的中国”和“最早的王朝”之称。

许宏在《何以中国》一书中，通过对一个个遗址的夹叙夹议，梳理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过程，勾勒出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轮廓，尝试给出“何以中国”的答案。

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段，中原王国先后建立起凌驾于周边王国之上的中央王国，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“广域王权国家”，中央王国和地域邦国处于一种特殊关系，中央王国是“国上之国”，周边地域邦国构成“华夏系统国家群”，他们共同构成了“华夏文明圈”。

虽然二里头不能与夏都画上等号，但种种迹象表明：公元前2000年的时间段，似乎就是王朝诞生的前夜。

五

中华文明，犹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，奔腾不息，从未断流。几代学者接续努力，用考古科学实证了“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、一万年的文化史、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”。

知从所来，明将所往。对历史深处的回望与探寻，正是为了指引并坚定未来的前行。历史的追问还在继续，努力回答那古老的问题：我们是谁？我们从哪里来？问题代代相传。不同的是，由于掌握前所未有的技术与工具，更多的惊喜与精彩将破土而出。我们从未知如此逼近答案。

“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”推开历史半掩的门，上古月色，横绝长空。



江河的赠礼

□ 冯天瑜 马志亮 丁媛

一
水是有生命之源的源泉，而文化由人这一高级有机体创造，因此，水（尤其是人类饮用、农作物灌溉需要的淡水）是文化生成的必备条件。人类有了稳定的淡水供应，方可经营定居农业，进而跨入文明门槛（以城市的出现、文字的发明及金属工具的使用为标志）。而能够为人类生存及文明发展源源不绝地提供淡水的，主要是河流。

河流，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。汉字的河流拟名甚多，大者如“江、河、川”，小者如“沟、涧、溪”，被统称为“水”（《水经注》称黄河为“河”或“河水”，称长江为“江”或“江水”）。江河纵横奔腾的流域，因有充沛的淡水供应和便利的水运条件，成为文明的发祥地。四大文明古国，皆仰赖大河的恩惠，比如，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之于古巴比伦文明，尼罗河之于古埃及文明，印度河、恒河之于古印度文明，黄河、长江之于中华文明。古希腊“历史学之父”希罗多德称：“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。”此语适用于诸大河文明，巴比伦、印度、中国等文明古国，也都是江河的赠礼。

二

诸大河文明奠定人类文明的基础，又多已被取代而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，而中华文明于起伏跌宕间传承不辍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领域广阔、地理形势错综，存在平行互补且有自然屏障相间的两个大河文化——雄浑的黄河文化和清奇的长江文化，所谓“北俊南娜，北肃南舒，北强南秀，北儻南华”。当黄河流域因垦殖过度、气候转向干冷、胡马南征而文明渐趋衰落之际，长江流域后来居上，发挥其优越的自然禀赋，成为粮食、衣被、财赋的主要供应区和人文胜地。黄河流域邻近游牧区，一旦长城被突破，就可能被游牧人占据。而“长江天堑”成为一道防卫线，拥有巨大经济、文化潜力的长江流域为华夏文明提供退守、复兴的基地。经由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承接与创造性发挥，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中华文明得以保持与光大。得两条大河的滋养与呵护，是中华文明于数千年间绵延伸展、从未中绝的原因之一。正如近人梁启超所说：“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。则以黄河扬子江之二大川横于温带。灌于平原故也。”

三

黄河纵横于北温带80万平方公里的高原和平原，那里曾经是林茂草盛、自然生态良好的地域，先在黄河诸支流（如洛水、渭水、汾水等）流经的台地聚集、狩猎，进而发展农业，奠定文明根基。现代意义的考古学在20世纪初展开于中国，首批田野考古用于黄河中下游。仰韶、龙山、大汶口等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发现，殷墟等商周故城的发掘，与《尚书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传世史典对先夏及夏、商、周三代文化在黄河流域繁衍的记述相映照，学界据此确认“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发祥地”。

长江流域广及180万平方公里，恰在北纬30度线这一“人类文明发祥线”两侧。20世纪70年代，浙江余姚发现河姆渡文化，其人工驯育稻谷推定距今7000—8000年，随后又发现长江下游的良渚、马家浜、中游的屈家岭、石家河，上游的大溪等“稻作文化”，湖南道县更发现距今万余年的人工驯育稻谷。故长江流域“稻作文化”历史之久远，绝不亚于黄河流域“粟作文化”。“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两大发祥地”成为学界新共识。

四

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的摇篮。就古人类栖息和农业发明的时间而言，长江流域似早于黄河流域。然而，黄河流域的黄土层结构均匀、松散，具有良好的保水与供水性能，蕴含较高的自然肥力，便利于木石—铜石农具时期的垦殖。虽然年降水量较少，但雨水集中在夏季，有利于粟、黍、菽、麻等旱作物生长，黄河流域率先成为定居农业文化发达地区。古史所载之五帝（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唐尧、虞舜）以及海岱地区的太昊、少昊所代表之族群，多活动于黄河上、中、下游，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的都城及经济、文化繁盛地带，皆在黄河流域。以《诗经》为代表的商周文学，儒、墨、法等学术流派，主要展开于黄河流域，形成齐鲁、三晋、三秦等丰富的文化区。

古时长江流域瘴气弥漫，土壤黏结，以木石器及初级金属器开垦不易，故先夏

及夏、商、周时期农耕经济落后于黄河流域。当金属器（尤其是铁器）普及为农具后，长江流域优越的水热条件渐次得以发挥。春秋战国时的巴蜀、荆楚、吴越等文化区在长江上、中、下游竞起，以屈原《离骚》为代表的楚文学及道家等学术流派，主要在江淮滋生。自东周以降，黄河—长江双峰并峙，“风—骚”竞辉，“儒—道”相济，构造了中华文化“和而不同”的多元一体格局。

自汉武帝经营南方，尤其是东晋、中唐、两宋之际，中原土族南渡，铁制农具与牛耕普及。在黄河流域继续发展的同时，长江流域得以开辟和熟化，演进为物产丰富、人文兴盛的地区。从隋唐到宋元明清，长江下游及长江中游相继成为粮米、布帛的主要供应地。唐代有“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”之说，南宋有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之谣，明清更流行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之谚。总之，自秦汉起，在黄河流域以政治经济重心雄踞中华之际，长江流域的开发也取得长足进展，后来居上。以户口论，在西汉，北方与南方之比为3:1；到东汉则变为6:5；已大体持平，至北宋则为4:6，南方呈反超之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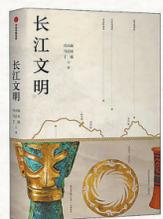
明清之际学者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议及文化南移：“三代以上，淑气聚于北，而南为蛮夷。汉高帝起于丰、沛，因楚以定天下，而天气移于南。”黄宗羲更具体地述评中古至近古文化的南北变迁：“秦、汉之时，关中风气会聚，田野开辟，人物殷盛；吴、楚方脱蛮夷之号，风气朴陋，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。今关中人物不及吴、会、久矣……而东南粟帛，灌输天下，天下之有吴、会，犹富室之有仓库匮也。”然而，经济重心南移并不意味着军政重心的随之南移，因为军政重心的确立除经济因素外还有别种缘故，如地理位置因以因素外，择都的习惯性标准、抗御北方胡人的战略考虑等，这使得经济重心已经南移的诸王朝大多仍将首都设在北方。位于黄河流域的军政中心，须依凭东南财赋的支撑。为调适这种“政北—经南”的格局，隋唐至宋元南北运河开掘，以繁庶的长江经济支撑地处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。随着大运河的开通，由黄河、长江、汉水、大运河构成的中华文化内环线正式形成。“西北甲兵”与“东南财赋”共同构成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赖以立国的两大支柱，而两大支柱所依托的正是黄河与长江。

五

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，近代尤甚。除了与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有关之外，也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推进线路相关。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，大体是由东南向西北渐次推进的。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通商五口都位于东南沿海。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成为最大通商口岸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，在增开的10个商埠中，长江流域就有4个（汉口、九江、南京、镇江），开放口岸已从沿海各地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。此后数十年，上海、南通、镇江、南京、芜湖、安庆、九江、武汉、沙市、宜昌、重庆、成都等沿江城市逐渐连为一体，形成长江经济带。由通商而刺激生发的近代工业不断吸引人流涌入，各江城规模与日俱增，功能远胜以往，中国近代中期最重要的两大工业基地，即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交汇地带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近代文化也循长江水道，自东南沿海向内陆渐次展开。

1911年10月，武昌首举义旗，上海、南京等沿江城市奋起响应，协力颠覆清廷，创建民国。当时的长江成为新旧、中外文化竞演的舞台，引领着中国的近代化进程。时至今日，长江仍为中国最广阔、繁盛之流域经济区，在保持经济强劲增长的同时，也纾解着生态的巨压，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持久生命力。

（本文为《长江文明》一书导言，标题为编者添加。）



冯天瑜、马志亮、丁媛著《长江文明》



《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》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 编著 科学出版社



《青铜文化》周广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美术出版社



《商文明》张光直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《中国文明起源新探》苏秉琦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《何以中国》许宏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《翦商》李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